

民族性、时代性与晚清中国社会爱国主义辨析^{*}

郭大松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近代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富民强国? 是否符合民族性或时代性要求? 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思想? 往往是学界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社会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功过是非, 对政府和各社会阶级阶层的救国方策、行为措施做出评判结论的依据。事实上, 坚持民族性与坚持时代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因各类人物思想认识的不同而具霄壤之别。只有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 分清传统爱国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 把是否符合时代性要求、坚持民族性立场的爱国主义, 作为评价一切晚清历史人物、事件功过是非的标准, 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关键词: 晚清; 民族性; 时代性;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8)01-0055-07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史研究中, 学术界对众多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功过是非, 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定位, 对各社会阶级阶层和政府的救国方策、行为措施的评判结论, 往往众说纷纭, 甚至是尖锐对立。究其实质, 不外所谓民族性标准和时代性标准问题之争。那么, 如何认识民族性和时代性标准, 坚持民族性和坚持时代性是否并行不悖, 即二者是否具有统一性?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 因而, 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既具空前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也与民族性标准和时代性标准问题紧密相关。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 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1]。在晚清中国社会, 到底具有什么内容的爱国主义真正能够救国, 重振中华? 显然, 在面对复杂纷纭的国际形势,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厘清晚清中国社会民族性、时代性与爱国主义的关系, 以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依然是学界的重要责任。

一、民族性与爱国主义

在我们探讨的领域, 民族性与民族主义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 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场合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文的民族性, 如题目所显示的, 是晚清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民族主义, 学界一般把它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衍生物。因此, 过去我们曾简单地视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 自它问世以来的二、三百年间, 曾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民族运动中, 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起到了进步作用。在这一层面和这一意义上, 所谓晚清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和民族主义, 其实是一回事。如是, 则何以用民族性而舍弃通常的民族主义呢?

总体上说, 民族性内涵中性平和, 文化学意义占主要地位。民族主义则激越昂扬, 政治学意义远大于文化学意义。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文化学和政治学意义轻重不同, 但时至今日, 二者的这种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存在, 保持民族

* 收稿日期: 2007-09-01

作者简介: 郭大松(1950—), 男, 山东蓬莱人,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性就不可避免；我们现在和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领域依然必须注意保持民族性。民族主义则不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在我们力求和平和谐发展，人类社会也要更文明、和平、和谐发展的今天及今后，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国家的民族主义如果膨胀起来，对中国和世界、对人类文明进程，都不是什么好事。况且，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以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较大分歧^{[3] (P5-21)}。因此，我们认为使用民族性概念要比使用民族主义一词更恰当、理性一些，尽管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社会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近代以来的所谓民族，是和国家这一政治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既是国家、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集成，又是国家、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载体。中国与世界许多近代国家不同，近代以前，虽然没有产生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但早已形成了明确而又根深蒂固的华夏民族观。中国社会这种民族观在晚清时期，逐步向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过渡演变。在晚清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民族主义发生学的视角以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从无到有，前60年即义和团运动以前，并不占主导地位。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各民族相互区别的特定因素。同时，作为意识形态，民族性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感情、情结，具体包括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热爱、忠诚等。而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一般说来，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 (P255)}。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形式主要是文化学意义上以教化的优劣为界标，没有与近现代国家相关联的政治意义，甚至与国家没有相对稳定的关系。古代中国人大都认定天圆地方，华夏即中国居天下中心，四周皆是教化不昌的蛮夷。华夏者，光辉荣耀繁荣昌盛之民族也。在这种天下观、民族观的支配下，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历经漫长时光磨合，世界的东方终于在华夏族即汉族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但是，国人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却基本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形成大致与天下观念的解构同步，从梁廷枏作《海国四说》、魏源作《海国图志》、徐继畲作《瀛寰志略》，中经洋务运动时期有识之士纷

纷将西方列强比作中国古代之春秋战国，到甲午战后维新派的保国保种保教思潮和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大规模全方位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立宪派急切但相对温和的君民共主诉求，革命派激进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实践，表明近代国人天下观念的日趋解体和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确立。

国人天下观念的解构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是近代西学东渐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产物。随着国人天下观念的解构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民族性问题就不再主要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地上升和表现为政治问题，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时民族性作为意识形态就由潜在地位突显到表层位置，表现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对自己国家在强烈认同基础上的深厚情感、执着的热爱、无比的忠诚。具体到晚清中国社会，则演化为各种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措施行为，潮涌潮退，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由于传统天下观念的解构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作为个体的国人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天下观念的解构迟早不同、快慢不一，对近代民族国家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大差异，因而与民族性紧密相连的爱国主义，总体上就表现为相应的两大不同类别：传统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这两大类别大致又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以前，尽管也有不同层次的近代爱国主义，但总体上说传统爱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义和团运动之后，则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传统爱国主义已经基本成为历史陈迹。这里首先谈传统爱国主义的问题。

传统爱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前的近代中国社会最普遍，其根基也最深厚，封建统治阶级中绝大部分人及农民阶级，都是这一类爱国主义的载体。这是因为，虽然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不同以往汹汹东来的西方“夷狄”，传统的天下观念日趋解体，近代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形成，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和整个农民阶级传统的华夏文明价值观十分牢固，他们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他们心目中，“中华民族”或国家，往往与“朝廷”划等号，尽管这个朝廷的主人过去曾经是“异族”，但他们早已在文化上被认同为华夏族了。

传统爱国主义保守、蒙昧地坚持民族性，恪守中国传统文明，拒绝引进和学习西方任何先进事物，甚

至从心灵深处崇尚上古三代之制。鸦片战争时期的龚自珍、梁廷枏，洋务运动时期的倭仁，维新变法和义和团时期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等，可算是此类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站在华夏即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严守夷夏大防、华夷之辨，反对外来侵略，爱国——爱朝廷，崇尚中国固有文明，拒斥一切外国及与外国有关的新事物，甚至不惜大规模利用民众的力量，试图把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统统赶出中国去。倭仁、徐桐、刚毅、赵舒翘等之盲目守旧排外的所谓“爱国”言行，人所共知，自不待言。然龚自珍曾被誉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梁廷枏称颂过西方物质文明乃至政治制度，他们的爱国言论也应归之为传统爱国主义一类吗？答案是肯定的。龚自珍爱国爱得很痴迷，以致面对衰世，恨当道之不争，苦天下之无才，无所顾忌，愤愤然尽情率性揭露时弊，呼唤“更法”、“改图”，率皆伤时骂座之论，爱国情感不可谓不炽烈。但是，他奋臂疾呼要“更法”、“改图”，从其所设计方案观之，大多是往回更，向后图，正所谓“药方自贩古时丹”。其一生两名篇《罢东南市舶议》和《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很能说明他对外来事物和维护传统体制的态度。梁廷枏著《海国四说》，比较全面地介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史地、政教、民俗、物产、外贸、近代机器生产及科技制造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不乏称道西方工业文明甚至政治制度之语。然而，称道归称道，骨子里对西方事物也还是深闭固拒、一心要守护传统旧体制的。如他对鸦片战争时期“师夷长技”的说法和做法就表示极大愤慨，指责“以夷攻夷”、“师夷长技”，是莫大“失体”之举；宣称“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4] (P172)}。而在近代中国，不“师夷长技”，不变革旧体制，虽然不能说是不爱国，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救国，因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3] (P1359)}。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中国社会正是在以上述这些人为代表的传统爱国主义的影响支配下，导致中国近代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延迟近20年光阴；致使求富求强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步履维艰，即使像李鸿章那样的权势人物也不得不为发展近代工矿企业而偷偷修建的铁路上用马拉运货车，以抵挡舆论；造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维新雷声大雨点小，草草失败收场；终于酿成了以盲目排外为特征、带有强烈传统爱国主义激情的“扶清灭

洋”运动，为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提供了借口，几构亡国灭种惨祸。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建立在保守、盲目、愚昧民族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其实际结果只能是误国和害国，根本不可能救国、富国、强国。

二、时代性与爱国主义

所谓时代性，其最本质的内涵是变化、发展，它依时间的推移而演进，据时代的不同而各异。从根本上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时代性没有民族、国家的界限，属于整个人类，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通行，即具有人类范围内的同一性、通行性和不可避免性，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各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进入同一时代有早晚先后之别。

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处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什么时代？这个时代的时代性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和相互隔绝到日益频繁往来，不可避免地在某种意义上相互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人们常说的“地球村”这一概念，其实就是这一过程结果的形象概括。中世纪以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这个过程十分缓慢。步入近代以来，这一过程迅猛加速，资本的扩张性是这一迅猛加速过程的不竭动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 (P256)} 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缘于其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它必须而且只有在运动中增值。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的产品，生产地本身已无法容纳，能够而且必须在满足生产地消费的同时远销本国乃至世界各地；同样，这种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也就远非生产地一地所能供应，而必须到远离生产地甚至本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搜求。于是，牟利的欲望驱使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驱使“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6] (P254)}。人类社会处在这一发展阶段，“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必将“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6] (P255)}。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步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先行一步的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都势必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

基础的世界交往,担负着建立世界市场和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在资本扩张本性的驱使下,西方资产阶级在进行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同时,也要着手制定和逐步完善进行这一世界性扩张的游戏规则。而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由于工业革命取得的卓越成就,资产阶级已经使自己强大到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程度,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非常革命的作用”^{[9] (P233)}。人类社会这时处在资本主义逐步在全世界取得普遍胜利的时代,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不可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这就是人类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时代性核心内容。

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具有世界上惟一薪火相传不曾中断数千年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帝国何去何从?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这就是采取积极应对的姿态,主动融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大潮。但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近代伊始大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诸如开放中外通商、开启近代机器工业生产、与世界各国建立近代外交关系等重大时代课题上,在鸦片战争后二三十年间还顽固地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就是后来形成的我们所了解的这样一部中国近代史。诚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根源在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古代中世纪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然而,资本扩张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强力的侵略性扩张与和平的互利性扩张。所谓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就是在违背主权国家意志的情况下,通过武力或武力恫吓强行达到扩张的目的。所谓和平的互利性扩张,则是通过外交谈判等和平途径,达到资本扩张的目的。认真考察晚清时期的历史事实,这两种扩张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我们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和平的互利性扩张,从根本上说,应持欢迎态度。虽然,所谓资本的和平互利性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来说不会是真正的平等互利,近代以来的后发展国家没有办法摆脱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先发展国家的剥削。但是,在人类社会近代历史进程中,资本不管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还是和平的互利性扩张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就像奴隶制社会的剥削、压迫、不平等,取代原始共产社会的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平等,虽然残酷,但却是历史的进步一样),而和平的互利性扩张,实际上可以说是各取所

需,后发展国家拒斥资本和平的互利性扩张,便无法奋起直追,这种情形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更多地是要从中国本身去寻求为什么中国近代社会是那个样子的原因,而不是只顾不加分别地一味谴责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这里只是顺便提出这一问题,本文的主旨不在这里,而在于探求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怎样才能救亡图存、富民强国。这也就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不同程度体现时代性的近代爱国主义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阻拒任何形式的资本扩张,坚守东方宗蕃体制,不承认中华以外有其他文明的存在,中外差距迅速拉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契机,西方列强以强力侵略性扩张为先导,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与固守蒙昧民族性的传统爱国主义不同,在如何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问题上,开明士大夫开始放眼中华以外的文明,逐步放弃蒙昧、保守的民族性立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形成了不同程度适应时代要求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次实践他们的救国主张。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生、发展,总体说来大致与资本主义在华扩张的加剧、民族危难形势的加深同步,具体看来则可划分为几个不同层次。

首先是较浅层贴近代性要求的一个层次,朦胧地感觉到了世界巨变来临,认为当时的中外情势,除文武典章制度之外,中国以外也有值得称道乃至学习的东西,主张“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以保国。林则徐、魏源以至后来的洋务派,可为其不同时期的代表。林则徐爱国主义的可贵品质永垂史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其介绍西方文明的贡献及为救时保国所提出的某些适应时代性要求的改革主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均举世瞩目,备受称道。但是,由于林、魏的时代保守势力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初步适合时代性要求的爱国救国思想主张难以形成具体的社会实践,只能仅仅停留在极少数人的思想层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崛起了一股被后人称之为洋务派的新兴力量,有感于亘古未有之中外大变局,为求富、求强,开始较大规模地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搞起了我们称之为洋务运动的“自强新政”,中国早期现代化在步入近代20多年后终于起步。

其次是具有明显背离传统倾向,较深层贴近时代性的一个层次,怀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华夏中心观念和东方宗藩体制,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的不足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点,主张乃至呼吁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积极了解和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以救时保国,避免华夏危亡,求致国家富强。徐继畲、郭嵩焘以至后来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是这一层次不同时期的代表。徐继畲参加过鸦片战争,战后历时5年,披肝沥胆,“稿凡数十易”,汇成《瀛环志略》十卷,较《海国图志》介绍西方文明和评说世界大势更清晰明了、严谨精确。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自始就非但未被视为像林则徐和魏源那样的爱国保国英才,反而屡受守旧排外者们的攻击。顽固守旧派批评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轻重失伦,尤伤国体”^{[7] (P482)},终使其“奉旨议处,书版讫令毁销”^{[7] (P481)}。郭嵩焘一生际遇还不如徐继畲,因在出使日记中有客观公正评价西方文明的字样,曾被朝野上下众多的封建卫道士一致指目为“汉奸”、“可杀”,生前备遭摧折,死后清政府亦不准赐谥,不予立传。此二人特别是郭嵩焘如此一生,或许有其它原因,但最主要的显然是他不但主张学习西方器物技艺,而且不时流露出严重背离传统华夏夷狄观的倾向,认为西洋政教风俗已远胜清王朝统治下的东方天朝上国,为当时整个社会所不容。其实,郭嵩焘的认识才是晚清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所谓早期维新派,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与洋务派救国方案其实并无二致,只是80年代末期以降,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洋务军工民用企业弊端的日渐显露及民族危机的加深,才有人开始与洋务派大员们在救国方策上产生分歧,开始酝酿要变封建专制为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了,但这种分歧,事实上应是在野与当政、理论家与实干家之间的分歧。

再次是设计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救亡图存方案,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次付诸实践。徐继畲、郭嵩焘及早期维新派,由于时势和个人的原因,他们的救亡图存思想主张,还不具备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条件。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统治阶级上上下下也有部分人认识到了不变法难以图存的现实。于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得到了统治阶级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开明官僚集团的支持,不仅提出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系统方案,而且在开明官僚的支

持之下开始将他们的方案付诸社会实践,发起了爱国救亡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在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下暂时归于失败,但它的时代性光芒和在晚清历史上造成的巨大影响是无法磨灭的。两年以后,统治阶级吸取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顺应日益高涨的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呼声,为了自救集体转向,搞起了自上而下大规模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中国社会终于走上了顺应人类社会历史时代发展大潮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经济、军事、政治、社会习俗等领域的改革逐次推开,不但传播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日益广阔的活动舞台,而且使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开始急剧蜕变,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基本形成。主张变法维新以救中国的一派势力这时同清政府走到了一起,催促着政府加快改革的步伐,而在新政改革中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中下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一派,则不满足于渐进式的改革,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救国方案,走上了暴力改造中国社会以适应人类社会时代性要求的道路。

最后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晚清社会不同时期还有一些人,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救亡图存救国思想主张,他们仅依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认定某些方面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切实可行的有效救亡图存、富民强国之法,大多表现为从具体救国活动入手,为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而尽个人所能尽到的责任。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等等。这些人的爱国救国主张和行为,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色,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那种认为在近代中国只有先赶走外国侵略者,然后才能求得民富国强的理论,显然有违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很难对踏踏实实救国救民的先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几点结论

从上述对晚清社会民族性、时代性、爱国主义问题的相关检讨中,在如何看待晚清社会民族性、时代性和爱国主义,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我们似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树立评判晚清历史人物、事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之统一的标准。

以往学术界评判晚清历史人物、事件的功过是非的价值尺度,实际上不外两种对立倾向,即或强调

民族性而忽略时代性,或强调时代性而忽略民族性。间或有试图既注意强调民族性,又不忘强调时代性的研究,落实到具体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上,一旦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时,就往往是各说各话,似是而非,其实质还是没有有一个合乎逻辑的价值尺度,难以确立统一评判标准。如果我们把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应该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摈弃有悖时代性的民族性(如传统的以所谓教化优劣为界标的“华夏夷狄观”)和失却民族性的时代性(如照抄照搬西方的一切),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分清传统爱国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把是否符合时代性要求、坚持民族性立场的爱国主义,作为评价一切晚清历史人物、事件功过是非的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才能救国。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守旧势力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蒙昧地坚持民族性的爱国,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和封建士绅、守旧官僚们蒙昧地坚持民族性的爱国,不是真正的爱国,其结果只能是误国、害国。对这一类的爱国思想、主张和行为,历史工作者应当予以反思检讨,不应予以盲目的肯定和颂扬。

2. 理性分析、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资本扩张。

在通行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的理论框架中,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不易之论,即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仅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等罪行看,这一说法似乎毫无问题。但是,这一定论使我们忽略了必要的进一步思考,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列强总是侵略中国?人们解释说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是因为中国那时贫穷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对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不应该是问题的结束,而应该是问题的开始:即中国那时为什么会贫穷落后,从而招致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更何况,如前所述,资本扩张有强力的侵略性扩张与和平的互利性扩张两种方式,后一种扩张方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时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应当欢迎和接受的方式。回观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以及鸦片战争以前近百年的中西交往历史,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是一味对中国采取强力的侵略性扩张,而

是有不少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谈判进行扩张的尝试和实例,凡是熟悉晚清史和近代史的人对此都很清楚。但过去我们往往只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的结果,并认定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没有像印度一样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殊不知那时中国的情形与印度不同,印度历史上基本可以说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可以号令整个印度的权威的中央政权;中国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但有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华民族意识已植根于每一个成员的骨髓,西方列强在进行资本扩张过程中,对中国与印度采取的方式总体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并非是广州反入城斗争、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扩张方式的斗争及义和团式的反扩张方式使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应当清楚,面对东方高度集权、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丰富自然资源和广阔巨大市场潜力的统一的中国,西方列强的终极目的是来赚钱的,战争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先行步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列强在晚清时期和近代的沙皇俄国特别是日本不同,沙俄和日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后起军事帝国主义,它们既没有西方列强那样广大的殖民地,又无强大的经济实力,出于封建主对土地的渴望和暴发户的野蛮、贪婪——特别是日本,由于国内资源贫乏和岛国心态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侵略性扩张一直是它们的主要手段。所以,历史工作者本着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应该恰当地区分外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的不同形式,避免站在传统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立场上,肯定和颂扬不应肯定颂扬的东西,贬斥批判不应贬斥批判的东西^①。否则,便不能清楚说明历史的真相^②,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3. 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为建立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

回顾历史,放眼世界,民族主义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今天,我们既要坚持民族性,借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要避免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坚持民族性,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应实事求是地评判传统爱国主义,肯定其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的合理、

① 像以往对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扩大通商、公使驻京建立近代外交关系、编练新式军队、修铁路、开矿山、设电线、开学堂、派出使节通使西方等建议,简单地斥为侵略要求等。

② 比如资本主义列强为什么同情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起劲地宣传鼓动中国进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等。

可贵性因素^①，舍此便丢掉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反省检讨其违背时代要求的落后性，不如此则可能使一个民族认识不到游离于人类历史进程之外的危害，造成失去球籍——地球村村民资格的危险。在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现实问题时，坚持民族性，应该把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繁荣作为对我们的激励，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吸取外国的先进成功经验，借他山之石，垒砌自己的富强之基，进而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华民族所应贡献的智慧和力量；而不应该像有的国家一些人那样，把邻国的发展繁荣看成是“现实威胁”^②，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这对其本国和邻国乃至世界才真正是应予重视和设法予以解除的“现实威胁”，极不利于“人类共同进步”，

不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8]。

参考文献:

- [1] 江泽民. 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N]. 人民日报, 1990-05-04.
- [2] 李文海, 等.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J]. 史学月刊, 2006, (6).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 [4] 梁廷枏. 夷氛闻记: 卷 5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 毛泽东选集[M]. 合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李慈铭. 越缙堂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Discrimination on National Character, Epochal Character and Patriotism of Chinese Society in Late Qing

Guo Daso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n what way does modern China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so as to enable its survival, to enrich the people and make the country powerful? The criterion which academic circles usually keep to comment on the points of view,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of modern China—especially late Qing society, to judge the scheme, conduct and measures which the government, social class and stratum adopted to save the country, is whether to conform to demands of national character or epochal character and whether to possess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In fact, persisting i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omplying with request of epochal character are fundamentally unified. Various views of different people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ontents of patriotism. Only if we unify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quest of epochal character, draw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patriotism and modern patriotism essentially, apprais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all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of late Qing society by the criterion whether to accord with the request of Epochal character and persist in stand of national character, can we sum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correctly.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epochal character; patriotism; enrich the people and make the country powerful

责任编辑: 时晓红

① 如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隔绝、近代之初整个中国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下。

② 日本最大在野党党首访华前称中国是现实威胁。见 2005 年 12 月 12 日中国青年报。